

乡土寓言的跨国之变

——从鲁迅评赛珍珠说起

[中國]朱 骅*

目 录

- 一、引言
- 二、鲁迅乡土写作的民族寓言
- 三、赛珍珠乡土书写中的反现代性寓言
- 四、结 论

一、引言

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是第三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 并且以中国题材作品成名, 其作品不仅受到对中国充满好奇的西方读者的青睐, 而且在中国读者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代表作《大地》(*The Good Earth*, 1931)位列1931年和1932年美国畅销书榜首, 相继获得普利策奖、豪威尔斯奖。《大地》及其续集《儿子们》(*Sons*, 1932)、《分家》(*A House Divided*, 1935)对19世纪末至二战前的中国北方农村社会作了全方位的描写, 是一部中国农业家族的近代史。

遗憾的是, 赛珍珠的中国题材写作在1949到1980年代前的中国大陆受到否定,¹⁾这其中除了政治因素外, 鲁迅(1881-1936)对她的评价也起了重要作用。

* 上海海洋大学副教授 hzhu@shou.edu.cn

1) 思慕, 〈猫头鹰的诅咒——斥赛珍珠的『北京来信』〉, 《世界文学》9 (1960) : 129-35; 徐育新, 〈赛珍珠——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 《文学评论》5 (1960) :

1933年春, 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说:

中国的事情, 总是中国人做起来, 才可以见真相, 即如布克夫人, 上海曾大欢迎, 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 然而看她的作品, 毕竟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传教士的立场而已, 所以她之称许《寄庐》, 也无足怪, 因为她所觉得的, 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 方能留下一点真相。²⁾

对于鲁迅的评论是否意在否定赛珍珠的创作, 国内的相关研究不少, 多数为赛珍珠辩护,³⁾并没有结合具体历史语境的深入研究。

我们需要注意到, 鲁迅本人和赛珍珠一样关注中国农民, 学者杨义(1946-)认为:“鲁迅是我国现代文学中把平凡而真实的农民, 连同他们的褴褛的衣着、悲哀的面容和痛苦的灵魂一道请进高贵的文学殿堂的第一人。”⁴⁾王瑶先生(1914-1989)也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把农民当作小说中的主人公, 鲁迅是第一人”。⁵⁾鲁迅是1920年代继“问题小说”后兴起的“乡土小说”的杰出代表, 也是成就最高者。

赛珍珠本人对鲁迅甚为敬佩。赛珍珠很看重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在1938年的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所发表的长篇演讲《中国小说》和鲁迅的中国文学史观相当一致, 论述中国小说发展的不少资料和观点出自此书。在谈到吴敬梓(1701-1754)的《儒林外史》时, 直接引述鲁迅的评说:“惟全书无主干, 仅驱使各种人物, 行列而起, 事与其来俱起, 亦与其去俱讫, 虽云长篇, 颇同短制, 但如集诸碎锦, 合为帖子, 虽非巨幅, 而时见珍异, 因亦娱心, 使人刮目矣。”⁶⁾她向美国读者介绍鲁迅, 她主持的《亚洲》杂志多次发表鲁迅作品的译

100- 07。

2) 鲁迅, 〈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信〉, 《赛珍珠评论集》郭英剑主编(桂林:漓江出版社, 1999) 4。

3) 姚锡佩, 〈从赛珍珠谈鲁迅说起——兼述赛珍珠其人其书〉, 《鲁迅研究月刊》6(1990): 39。

4)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171。

5) 王瑶, 《鲁迅作品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59。

6)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229。

文，宣称鲁迅应当被当作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很可能是美国第一个对鲁迅作出如此高的评价的知识分子。

奇怪的是，为什么两个同时代的人，面对共时的中国，书写共同关心的乡土，赛珍珠却会被鲁迅排斥，难道仅仅因为赛珍珠是寓居中国的美国人？是鲁迅的民族主义在作祟？赛珍珠的中国乡土题材作品不仅在西方叫好，在翻译进入汉语语境后，也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可和赞美。叶公超(1904-1981)、庄心在等都撰文分析了她的《大地》，对这本小说予以充分的肯定，⁷⁾即使胡风(1902-1985)、伍蠡甫(1900-1992)等左翼作家也对她的创作予以一定程度的颌首。⁸⁾但为何鲁迅就是觉得赛珍珠只是写出了一点浮面的情形？除了书写语言之外，真正的思想分歧在哪里？

鉴于他们二位创作中体现的强烈的现实关怀，我们不妨结合“寓言”(allegory)这一特殊文类的意指特征，分析鲁迅和赛珍珠在共同的乡土兴趣之外的意指差异。寓言本质上只是一个底本，以此为基础产生各种可能的理解副本。由于作者不同，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不同，即使同样的题材也可以产生不同的寓意。在这言此意彼的过程中，鲁迅和赛珍珠的乡土书写之间也许相似的只是“言”，即文字描绘的表象，而差别的是意，即作者的意指。这一差异也许才是鲁迅对赛珍珠所作价值判断的真正根源。

二、鲁迅乡土写作的民族寓言

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1910-2005)1947年发表的《乡土中国》的

7) 叶公超，〈反映中国农民生活的史诗——评赛珍珠的『大地』〉，《赛珍珠评论集》郭英剑主编（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6-9；庄心在，〈布克夫人及其作品〉，《赛珍珠评论集》郭英剑主编（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66-72。

8) 伍蠡甫，〈评『福地』〉，《赛珍珠评论集》郭英剑主编（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16-25；胡风，〈『大地』里的中国〉，《赛珍珠评论集》郭英剑主编（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91-100。

第一句话即是“从基层看上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对此稍作解释后，他进一步提出：“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⁹⁾既然抗战后的中国是乡土的，那么在1920年代的鲁迅看来就更是乡土的了，也就毫不足怪鲁迅在1920年代发表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如《风波》、《阿Q正传》、《祝福》、《故乡》等，所反映的都是乡土社会中的乡下人，以致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传统中常被归为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

然而，在做进一步的讨论之前，“乡土”作为一个特定的，支持本研究的核心概念，有必要进行简要的廓清。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的1984年再版序言中曾写道：“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来源，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¹⁰⁾本研究所使用的标志一种文学类型的“乡土”概念，沿袭的正是这种地理文化意义，而不仅仅是题材范围或人物身份。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发展史上，以乡村为叙事背景，以乡村人物为主要人物的小说创作，数不胜数。但自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之后，尤其从19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开始，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日益受政治影响与控制，强调写作在选材与提炼主题时须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事件和具体路线政策相吻合，因此大量书写乡村和农民的作品侧重揭示乡村生活中的尖锐阶级矛盾和斗争，缺乏地方特色，缺乏整体性的民族传统呈现与反思，只能被看作当今大陆文学教科书所统称的“农村题材小说”，以示与以文化反思为核心的“乡土小说”作区别。

鲁迅本人曾经在1920年代对“乡土文学”划过一个描述性的范围：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克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也只见隐现着乡愁，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¹¹⁾

9)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6。

10) 费孝通，《乡土中国》4。

在这里，鲁迅强调了“乡土文学”的如下几点特征。一是远离故乡侨寓都市的人写自己的故乡；二是此类作品必须能让读者体验到某一特定地域的地理风貌与人文气息。前者是条件，后者是内容。远离故土所产生的时空距离带来乡愁，但侨寓在被西方现代性所改变的大都市这一事实却也暗示回眸的视点是西方的，是具有现代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故乡的再发现与再认识，蕴含了复杂的文化政治与主体意识，由此也可以肯定，此类乡土小说所呈现的地域文化是有选择的，是经过特定的文化政治思维过滤后的残留物。

1. 鲁迅的乡土小说概述

鲁迅的小说创作在数量上不算多，几乎全部写于1920年代，收集在《呐喊》和《彷徨》两部集子中。当鲁迅用归纳法提出“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时，他未必将自己侨寓北京时所写的反映浙东水乡的小说归在此类。当《阿Q正传》的戏剧改编者将故事地点排在绍兴，让阿Q讲绍兴话时，他明确表示过不满。“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¹²⁾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鲁迅最熟悉的“乡土中国”就是以绍兴鲁镇为中心的各个村庄。因为乡村人物缺乏流动性，人和风俗之间绝无剥离的可能，风俗文化细节支撑着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与生动性，结果是他的小说具有浓郁的浙东乡土气息，所呈现的江南水乡特有的地理风貌、文化传统，对读者来说不啻一副优美的乡土画卷。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鲁迅不希望读者关注他的作品中明显的地域性，这种刻意的视而不见的意图何在？也许原因就如他自己所说“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¹³⁾这里“无聊的副作用”固然指特定的地域情调对读者的吸引力。地域文化的审美性被以“无聊”

11)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5。

12) 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49。

13) 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149。

冠之，因为这种温情愉悦的风土调子违背了鲁迅的书写政治，即如他本人所言“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¹⁴⁾鲁迅所希望的能够较为集中的“力量”其实就是他以为能产生“疗救”作用的药效。当他发现自己作品的乡土性吸引了未曾预期的过多的注意力时，他只能自己跳出来将神迷在异域情调中的读者向痛苦却深刻的文化反思场中驱赶。可以这样说，在日渐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语境下，以地域文化氛围浓郁的“乡土小说”开展深层文化批判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怀旧的阅读心态削弱甚至屏蔽了作者所追求的反思性。无奈的鲁迅只能自己站出来直言作品的真实意图——这种言在乡土，意在国族的写作是一种把脉与疗治中国文化问题的寓言。

2. “呐喊”中的民族寓言

鲁迅的乡土小说中最经典的几篇都收集在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中。与“呐喊”这一意象行为对应的是他和金心异（钱玄同）对话引出的“铁屋子”寓言——大声呐喊也许可以惊起铁屋子中沉睡并即将闷死的人中的几个，尽管这少数者可能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但至少有了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¹⁵⁾然而，这里牵涉到“呐喊”的主体与受众问题。“呐喊”的主体是鲁迅和鲁迅志同道合的几个文艺青年，还是那一时代的上层知识分子？“呐喊”的受众是无知的乡下人，还是包括了接受现代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国民？

在同一序言中，鲁迅还回顾了自己在日本弃医从文的历史，并提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¹⁶⁾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呐喊”的受众应该是“愚弱的国民”。

再看一看《呐喊》中所收录的14篇小说，除去写小动物逸事和寓居北京的

14)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6。

15)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41。

16) 鲁迅，〈呐喊·自序〉439。

几件生活事件，几乎全部是以村落和小镇为背景的乡下人的故事。由此可知，鲁迅是将占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乡下人当作国民的代表了。

然而悖论在于，占中国人口主体的乡下人几乎不能读不能写，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听到以书面文字为载体的“呐喊”，而真正听到并对“呐喊”做出回应的是秉持启蒙主义的城市知识分子，他们将鲁迅的乡土小说奉为圭臬。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对他的乡土小说拍案叫绝，并在某种程度上帮助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形成自己对乡村的情感与理性批判。如果说，鲁迅的乡土小说是为知识分子而写，是为城市读书人构筑现代性入侵下的中国乡土图景，其实并不为过，只是这与鲁迅预期的书写目标之间产生巨大的悬隔和落差。当然，学者刘禾在使用叙事学方法分析了《阿Q正传》之后指出，知识分子读者其实也是“看客”之一，¹⁷⁾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也是鲁迅疗治的对象之一。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乡土”对于鲁迅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文化概念，其空间、其人物已被充分论据化、例证化，是建构一个民族寓言的媒介。一个地理特征明显但意指不明的地域，实际上喻指一个正在缓慢转变的国家，乡土的寓言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寓言。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1934-)曾提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是人类学所称的独立或自主的文化。相反，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生死搏斗之中。¹⁸⁾他以鲁迅的作品作为分析样本，指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特别当它们的形式是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表达形式的机制——例如小说——上发展起来的……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¹⁹⁾那么鲁迅的乡土小说在怎样的意义上成为“第三世界的大众，他们的文

17) 刘禾，《语即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91-92。

18)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Late Capitalism*)，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521。

19) 詹明信523。

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鲁迅对这种冲击形成了怎样的价值判断？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鲁迅和当时中国所受到的是西方现代性的冲击，这一冲击依仗着政治、经济和军事而来，却又弥散在文化的空间，造成传统儒家思想体系的断裂。长期以来秉持着士大夫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感到了危机、屈辱，却又无力还击，只好一直隐忍着，伺机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刘小枫使用舍勒(Max Scheler, 1874- 1928)的“怨恨”价值论分析(ressentiment)，对现代性和中国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研究。我们不妨借助这一理论指向追溯鲁迅写作乡土小说的精神特质。

舍勒认为“怨恨”的精神品质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根源，构成了向外倾泻精力的无止境活动欲的动机结构。由是“怨恨”成为现代性的心理基础与常态机制。他对“怨恨”做过一个描述性定义：

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这种“强抑”的隐忍力通过系统训练而养成。……这种自我毒害的后果是产生出某些持久的情态，形成确定样式的价值错觉和与此错觉相应的价值判断。²⁰⁾

由舍勒的描述性定义可以看出，怨恨属于一种反应性情感，其形成有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说，在这种持久的情绪产生之前必须受过一次他人的伤害，但对他人的伤害却不能立刻做出相应的反击，不得不隐忍；而之所以隐忍是由于暂时的无能和软弱，这种感觉始终在折磨着当事人。

这种因无能做出及时反击而被迫隐忍的情态，经由伺机报复感、恼恨感、嫉妒感、厌恶感上升为怨恨。然而，和嫉妒、报复等需要特定诱因的情感不同的是，怨恨心态并不产生于某一特定具体的诱因，也不随特定诱因的消失而消失。²¹⁾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鲁迅及其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的形成

20) 舍勒(Max Scheler), 《道德建构中的怨恨》(*Das Ressentiment im Aufbau der Moralen*), 罗梯伦译, 《舍勒选集》(上海: 三联书店, 1999) 401。

动力正源于这种“怨恨”心理结构。

回头看看鲁迅的乡土小说创作的历史语境，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民族的命运未卜，刘小枫指出：

现代中国思想的价值偏爱结构受民族及其精神文化理念的生存性比较支配。由于西方列国的殖民拓展，不仅传统的中华帝国(所谓‘天朝’)的政治统治面临着危机，而且传统的精神价值理念和制度理念的正当性亦遭到质疑。中国士大夫和新兴知识人面临具有高度文化理念和强势政治制度的异族入侵，这种同时夹带着文化理念和政治制度的异族入侵在中国并不乏异族入侵的历史上还是第一回。所谓“中国问题”——中国何以能富强，中国文化精神和政教制度何以能继续生存，是在与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理念的民族性生存比较中提出的关涉中国之生死存亡的问题，它成为现代汉语思想的基本语境。²²⁾

这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进行持续性的中西比较，为民族性辩护，民族性文化的优劣比较潜隐在“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洋务派思想中，也体现在固持得几乎行为荒诞的国粹派思想中，这些知识分子竭力与一种他们感觉到却又看不到的力量较劲，总在宣传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有足够的资历与西方相比较，却在经济-政治-技术等实力方面事实上无法进行比较，于是在思想理念的民族生存式比较中失去平衡——自卑与自傲的悖论性组合构成基本的怨恨样态。

另一派则是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派。他们由怨恨而生的心理能量并不弱于进行民族性辩护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却将这一力量用于反思，因为这一派认为只有主动现代化，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才能摆脱中国当时的被动懦弱状态，所以他们自觉地体认西方现代性。他们的怨恨不是向外，而是转向针对抵制现代性进程的旧传统旧文化，以及这种旧传统旧文化赖以存在的乡土中国。

21) 舍勒, 402。

22) 刘小枫, 381。

3. 乡土文化批判与民族认同

从文本来看，鲁迅的乡土小说内含着深刻的文化批判。寓居在大都市里回眸故土的知识分子有着现代性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带来的首先是强烈的不安全感、耻辱感，继而是激愤感。五四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激愤通过政治行为和文化行为，由上而下，由城市波及乡村。鲁迅的乡土小说只是其中的形式之一。当他对着麻木愚昧的中国乡土社会呐喊，其激愤之情是每一个读者都能感受得到的。只是让鲁迅和鲁迅的读者们寒心的是，乡土社会就像一堵沉默的石墙，屹然不动，启蒙知识分子只听到自己那被衰减后的无奈回声。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体现在乡土小说中就是“国民性”批判。刘禾认为，“国民性”只是现代性理论中的一个神话。大多数中国理论家都相信“国民性”是某种本质的客观存在，模糊了“国民性”神话的知识构成，使人们看不到“现代性”的话语在这个神话的生产中扮演了什么角色。²³⁾“国民性”本来是欧洲种族主义国家理论中的一个概念，把种族和民族国家的范畴作为理解人类差异的首要准则，以帮助欧洲建立其种族和文化优势，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进化论的理论依据。梁启超(1873-1929)等晚清知识分子将这个概念从日本引入时，目的在于建立像日本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如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国民十大元气论》、《新民说》等。²⁴⁾新文化运动前中国知识分子论述的“国民性”与西方相比并无明显优劣，各有千秋而已，但陈独秀(1879-1942)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很快改变了这一切，这一运动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全面认可使“国民性”成为中国传统的全部能指，成为启蒙的主要对象。知识精英们认为中国国民缺乏自我意识，必须通过启蒙教育唤醒他们。出版业的日渐繁荣，杂志读者的大量增加，使文学受到中国现代性理论的青睐，被看作实现“国民性”改造的最佳手段，即如鲁迅所认为的，善于改变精神的首推文艺。²⁵⁾

23) 刘禾(Lydia H. Liu),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 1900-1937)》(*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宋伟杰等译(北京: 三联书店, 2008) 73。

24)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饮冰室合集·专集》(上海: 中华书局, 1936)。

尽管从后殖民的视角来看，“国民性”在中国被本质化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殖民话语的“臣属”，但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蔡元培直到鲁迅等精英知识分子通过这一话语从否定性那一面建立起华夏的国族认同。因为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语境中，“积贫积弱”、“愚昧麻木”的“国民性”话语容易得到知识界的普遍认可，形成全民族的危机认同，并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迸发出革新的能量。鲁迅的乡土小说也许无法让偏居一隅的“愚昧”乡民们接触到并形成强烈的自我认同，但至少激活了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反思，并建立起一个有关华夏民族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也许正是鲁迅在书写乡土时总是有意无意地让一位返乡的游子型知识分子在场，甚至干预叙事的重要原因吧。

二、赛珍珠乡土书写中的反现代性寓言

赛珍珠成名比鲁迅晚了十多年，从赛珍珠的个人传记和早期所写的文章来看，新文化运动对她这样一位寓居中国的美国女知识分子也产生了很大影响，²⁶⁾尤其是形成了她的平民文学观。在鲁迅辞世前，她出版了6部长篇小说，以及一部短篇小说集《结发妻》(*The First Wife and Other Stories*, 1933)。²⁷⁾所有这些作品都是中国题材，而且主要书写中国乡土。在鲁迅对赛珍珠作出评价时，译成汉语的只有《大地》和《青年革命者》两部。从鲁迅后来于1936年写给日本朋友增田涉(1903-1977)的信可以看出，他所作评论只是基于胡仲持(1900-1968)翻译的《大地》，²⁸⁾因此下文讨论将集中于这部影响力最大的作品。

25)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39。

26) Pearl S. Buck, *My Several Worlds*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54) 124.

27) 这6部小说分别为：《东风：西风》(*East Wind: West Wind*, 1930)、《大地》(*The Good Earth*, 1931)、《儿子们》(*Sons*, 1932)、《分家》(*A House Divided*, 1936)、《母亲》(*The Mother*, 1934)和《青年革命者》(*The Young Revolutionist*, 1932)

28) 鲁迅，〈1933年9月15日致增田涉信〉，《赛珍珠评论集》郭英剑主编(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5。信的相关内容如下：九日手书奉到。关于《大地》的事，日内即转胡

1. 田园牧歌与帝国主义的怀旧

加拿大著名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弗莱(Herman Northrop Frye, 1912-1991)在论文《各种类型乌托邦在文学中的呈现》(*Varieties of Literary Utopias*, 1963)中分析了文学描绘的各种理想世界, 由此指出, 人们借以逃避现实而幻想出的地方, 可以按照历史指向的不同细分为乌托邦和田园牧歌。他认为尽管二者都属于人们想象中的乐园, 但乌托邦是城市, 田园牧歌是乡村; 乌托邦往往指向历史的未来, 而田园牧歌指向历史的过去; 乌托邦多是进取的, 田园牧歌则是逃避的; 乌托邦从文学进入政治, 推动革命与社会进步, 田园牧歌从政治退隐文学, 拒绝参与社会而走向保守。²⁹⁾结合弗莱的观点, 中国大陆学者周宁(1961-)认为, 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到来, 西方的中国形象在现代性自由与进步大叙事中逐渐黯淡, 但并没有消失, 而是进入现代主义视野内, 变成浪漫主义的异国情调的审美想象。他进一步指出, “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现代主义美学超越现代性异化的田园牧歌, 作为前现代想象中的‘他者’, 在时间上代表美好的过去, 在空间上代表美好的东方, 寄托着现代主义思潮中对怀旧恋旧与精神和谐的向往。”³⁰⁾

读者只要稍作对比就会发现, 赛珍珠的每一部中国乡土小说都是以理想化的永恒而宁静的中国田园图景开头, 这已经成了她的小说的美学特色。《大地》开头的第一句就是“今天是王龙成亲的日子”。接着写到:

他探出手去感知外面的空气, 窗洞大小只够手勉强伸出去。一缕微风轻柔地从东方吹来, 这风柔和, 呜呜的, 充满水汽, 这是好兆头。田里庄稼需要雨水灌溉。今天不会有雨, 不过用不了几天, 只要风一直刮, 雨就会来。³¹⁾

风一阅。胡仲持的译文, 或许不太可靠, 倘如是, 对于原作者, 实为不妥。

29) Northrop Frye, “Varieties of Literary Utopias,” *Utopias and Utopian Thought*, ed. Frank E. Manue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6) 31.

30) 周宁, 〈中国形象: 西方现代性的文化他者〉, 《粤海风》, 3(2003): 4.

<http://dspace.xmu.edu.cn/dspace/bitstream/2288/21096/1/B8.pdf>, 2010年12月8日检索

31) Pearl S. Buck, *The Good Earth*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1) 1.

一个即将成亲的人和即将到来的春雨孕育生命的关系，暗示了生命轮回和季节轮回的对应关系——大地在春天靠着雨水抽穗，王龙这样的庄稼汉在春天开始繁衍新的生命，王龙由此成为这种田园图景的图腾。

对即将消失的农业时代的怀旧情绪，是当时整个西方现代性的共同特征。殖民主义使整个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陷入现代性的喧嚣与纷扰之中，越来越多的文学流露出对前现代的审美性怀念。赛珍珠抓住了时代的怀旧情绪，从审美意义上向读者呈现一个恋土的、宁静的、亘古不变的中国农村。早在1925年她就表达了这种怀旧情绪：

这乡村处乱不变，那么平和。这里的居民只知道，也只在乎先祖们所知道的，所热爱的，所赖以生的一切。从容安详地耕作肥沃的土地，之后收获上天丰厚的恩赐，日子就这么过去。有时黄河——这自古以来的痛苦之源——会带来翻卷混浊的洪水，于是就有一年苦日子，他们埋葬了死者，坚忍地承受着。……在这不为人知的世界的一角，生活如此深邃，如此平静地进行着。生与死，不幸与富贵，都以极简约的方式为所有人共知共享，从不逾越古老的传统。³²⁾

这里的图景虽然并不亮丽欢快，但却平静而恒常，虽然指示的是中国，但实际上更像是《圣经》中的黎凡特地区，或者理想化的美国早期边疆生活。在乡土的环境中，生与死似乎只是“存在”的不同样态，处于永恒的循环之中。在《大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

太阳火辣辣地照在他们身上，这是初夏时节，她的脸上不久就挂满了汗珠。王龙脱下衣服，光着脊背，但她仍旧穿着衣服，薄薄的衣服已经完全湿透，就像一层皮肤那样紧紧地裹着她的肩膀和身子。不用任何的语言交流，他和她一小时接着一小时默契地配合着，他已感觉不到劳动的辛苦，他只知道他们两人似乎已融为一体。他已经失去了连贯的思维，这里只有完美的劳动韵律，一遍又一遍地翻晒他们的土地。正是这泥土砌起了

32) Pearl S. Buck, "China the Eternal," *Living Age* (7 February, 1925) : 325-326.

他们的家，喂养了他们的身体，塑成了他们的神仙。翻开的土地黝黑肥沃，锄头一点就立刻酥松。有时他们会翻出一块碎砖，发现一片木头。这并不稀奇。某个年代，某个时间，这地里埋葬过尸体，坐落过房舍。如今都回归土里了。他们的家，他们的身体，某个时候也终要回归这土里，在这块地上一切都有其轮回。他们继续干活，一起移动脚步，一起在土地上创造成果——无需任何语言。³³⁾

这里的一切是宁静的，是人和土地的最简单关系，是剥离了社会复杂性的亚当和夏娃时代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体完全纳入自然的轮回之中，尘世上的人们被赋予一种超越现世的永恒性。纷纷扰扰，悲欢离合，终究尘埃落定，一切回归到永恒的大地中，化为尘土，等待再生。

宁静、淳朴、循环和亘古不变似乎是赛珍珠描绘中国农村的关键词。中国农村内部的各种尖锐矛盾被“括除”了，因为中国的农业问题和美国读者无关，他们只需要有一幅展示美好往昔的农业时代的画卷，以抚慰工商时代的心理失衡。中国农村的历史等于没有历史，中国农村的时间等于没有时间，因为这里只有生命循环和四季更迭，但没有打破这个封闭圈的变化。费孝通先生曾对中国农村结构作了如此评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地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泄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靠着这个自然循环，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³⁴⁾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一个奇特的现象，往往是追随帝国主义扩张来到海外的参与者，如殖民官员、洋商和传教士等人在追怀被殖民前的殖民地文化，也就是他们初到此地的当地文化。这种追怀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们所渴望的生活形式恰恰是他们刻意去改变或毁灭的，怀旧总是在帝国主义的语境中存在。美国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罗萨尔多 (Renato Rosaldo, 1941-) 将这种怀旧称为“帝国主义的怀旧”(imperialist nostalgia)。他指出这类怀旧是以一个悖论为轴心的：

33) Pear S. Buck, *The Good Earth* 33-34.

34) 费孝通, 《费孝通自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161。

杀掉一个人，再为被杀者哀悼，或者说，有人故意改变了一种生活方式，然后遗憾一切没有保持它们被干涉前的状态；更远点说，人们破坏了环境，然后人们开始崇拜自然。不管是什么样的版本，帝国主义的怀旧所摆出的姿态都是“纯洁无邪的惆怅”，既抓住人们的想象力，又隐藏了与残酷统治的共谋关系。³⁵⁾

在这个为意识形态所分裂的正在变化的世界中，想象中停滞的野蛮社会成了建构西方文明优越身份的的稳定参照物。“西方”不断创新，因而就向往更加稳定的世界，不管这个稳定的世界存在于“西方”的过去，还是存在于落后的“他者”文化中，抑或二者的混合。这种惆怅在方式和世俗概念中的“进步”关系密切，当所谓的文明进程使现代生活在形式上不稳定，这种变化的始作俑者，在目睹“他者”文化的形变时，就觉得好像是他们自己个人的失落。

既要谈论被自己所摧毁的事物，又要表明自己的清白，“怀旧”对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来说是再适合不过的方式。实际上，“帝国主义的怀旧”的主要力量在于，它往往和更早时代或先前生活阶段的单纯而温馨的回忆联系在一起，如1927年北伐军到达南京之前赛珍珠在华所拥有的优越生活。“南京事件”所表现出的现代性精神特质之一“怨恨”，使作为传教士的赛珍珠不寒而栗，促使她进一步走向过去。怀旧所具有的相对亲切温和的特质，使“帝国主义的怀旧”能将负有责任的帝国参与者变成一个清白的旁观者。

2. 中国乡土小说的美国寓言

《大地》出版于美国经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之时，许多美国人正遭遇过度追求利润的工商主义所带来的恶果。整个美国弥漫着对往昔和谐农业社会的怀旧，而赛珍珠所生活的中国基本还是一个农业社会，连续几年的皖北农村生活也给她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因此她在作品中有意识地复活了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的“农业中国”原型，借以抚慰饱受创伤的美国读者。

35) Renato Rosaldo,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1989) 70.

赛珍珠独特的在华阅历使她有能力书写处于前现代生产力水平下的中国农民，而这些前现代中国农民与土地以及大自然的关系，和美国西部农业开拓者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使她能够通过书写中国农民，寓言性再现美国历史中曾经风行过的重农主义精神——那以自耕农为代表的边疆精神、自足的生活态度和面对自然灾害时的顽强意志。尽管随着美国日渐工业化，这种对早期历史的记忆会潜入美国文化心理的深层，但正如保尔·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在《从文本到行动》(*Du texte a l' action*, 1986)中所论述的，历史记忆与想象叠加，一旦外部条件合适，想象就会在各个方向上扩散开来，激活以往的经验，唤醒沉睡的记忆，浇灌临近的感觉场，使历史记忆被迅速放大和膨胀。³⁶⁾

赛珍珠对重农主义过度追求生产力的怀疑正好与美国的时代背景一致。“大萧条”使人们已经不再执着于效率神话。1930年代的美国农业大臣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 1888-1965)在执行“新政”中的农业计划时，提出的处方竟然是沿袭一个由来已久的汉学观，即被汉学家们称作“常态的谷仓”(ever normal Granary)的古代中国农业体系——政府在收成好的时候购进粮食，在灾荒时卖给公众。“如果我们对农业政治家有真正理性的理解，”他在1926年如此写道，“我们就可以在美国创立一个体系，融合‘常态的谷仓’的中国思想，处理我们的生产过剩。”³⁷⁾尽管最终于1933年通过的《农业调节法》通过补偿自愿减少耕作田亩数的农场主以保持农产品价格，和他的思路不一。但华莱士进行国家干预政策时联系源自中国的实践方法，可以为理解《大地》所受到的不可思议的欢迎度提供更深层次的历史语境。我们可以认为，《大地》为1930年代美国的农业危机和挽救方法提供了象征性文本。

《大地》以怀旧为特征的寓言性还表现在其边疆化的文化定位。这是一个没有宗族冲突，没有阶级剥削，甚至没有固定的阶级身份的空间，这也不是任何可以识别的中国乡村，因为清末民初中国乡村的社会压迫极其严重。王龙对土地的执着是远离了社会关系网络的人与土地的基本关系，王龙通过勤劳远离

36) Paul Ricoeur, *Du texte a l' action* (Paris : Seuil, 1986) 219.

37) Henry Wallace, "Weekly Column," *Wallace Farmer*, 51 (October 8, 1926) : 1314.

了社会纷扰。“起初，有很长一段时间，王龙似乎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只想一个人和自己的土地在一起。”³⁸⁾大地的召唤激起了王龙全部的人生能量，让人想起杰克·伦敦所描写的阿拉斯加荒原对充分工业化时代的男人们的吸引力，《大地》中的土地使男人通过艰辛的体力活动复原在工业化中日渐萎靡的斗志。“来吧，秦，伙计——来吧——叫上他们——我到地里去！”³⁹⁾然而和伦敦笔下那人迹未至的荒原和海洋不一样，精耕细作千年的中国土地让王龙不需要冒险，只通过干活就可以获得摆脱社会对人的自由的束缚。

《大地》具有神话的吸引力还在于赛珍珠故意不对中国社会进行以政治为核心的描写。⁴⁰⁾没有国家干预的中国农民生活如同早期美国的农业边疆，似乎享有一种原始的自由。《大地》中没有出现政府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干预，除了大堤维护不善导致洪水泛滥和偶尔在灾荒年月出现的官方收税人，甚至没有任何影响中国农民生活方式的国家存在。这种对中国农村的“边疆化”呈现传达出对自由边疆时代的怀旧，并为这种自由在工业文明进程中消失而叹息。

“安土重迁”作为“农业中国”话语原型的一部分，也是导致王龙在怀旧时代受欢迎的原因之一。王龙是这类农民的典型，他只迷恋他的土地，即使来到城市也是为躲避一时的自然灾害，他终究会回到那一块祖辈生息的土地。在南方逃难的日子里，他生活极端贫困，朝不保夕。即便如此，王龙魂牵梦绕的还是故乡的田地。他知道，流落城市靠乞讨和拉黄包车出卖苦力远非长久之计，只有回到故乡自己的田地上才有希望。只有当他脚踏着地里的泥土，春耕时手扶犁把，秋收时手持镰刀，他才会感到生命的充实。⁴¹⁾王龙的这种执着让那些因为经济危机流落在城市街头的美国人看到了回归的希望，看到一种可能的美好未来。

38) Pearl S. Buck, *The Good Earth* 143 ; 16 ; 139.

39) Pearl S. Buck, *The Good Earth* 213.

40) Colleen Lye, *America's Asia : Racial For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1893-1945* (Princeton : Princeton UP, 2005) 215.

41) Pearl S. Buck, *The Good Earth* 126.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两位作家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中国乡土书写尽管存在一些表面的差别,例如鲁迅善写结构精巧意蕴复杂的短制,赛珍珠善写情节曲折意境开阔的长篇;鲁迅作品呈现江南水乡(浙江绍兴),赛珍珠热衷于中原大地(安徽宿州);鲁迅试图将乡下人置于深宅大院和市井街头,以全面呈现乡村各阶层的文化结构,赛珍珠突出辽阔大地上劳作的农夫和小村庄土屋中自足的农家生活。但这些只是一些由生活阅历造成的浅表的差异,在乡土文化的传神性方面二人不分伯仲,二人的深层差别在于作品的寓指。

鲁迅希望通过乡土书写达致他以为是第一要务的“国民性”改造。从他的各类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阅读日本人涩江保(1857-1930)翻译的《中国人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894)就接受了“国民性”概念。⁴²⁾他对“国民性”这一西方话语的接受与理解,以及将“国民性”等同于没落的传统中国文化,实际上源于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现代士大夫情结”。他们在西方现代性入侵后的民族生存性比较中,在不断受伤却又不得不隐忍的状态下,形成了与现代性密不可分的“怨恨”心理结构。鲁迅的“国民性”书写是在知识个体不得不接受西方现代性之后,形成的与现代性的视域融合,在具体的叙事中不断以归乡知识分子的在场,反衬中国“国民性”的现代转变之难,以及提醒现代的知识分子读者做自我反省——反省自我的劣根性,反省知识分子与草根民众之间的思想疏离。

相比而言,赛珍珠本质上是一个反现代性异化的作家。她本人就是西方现代性入侵华夏的成员之一。她是肩担着资本主义人文精神的新教传教士,在教会大学中讲授体现现代性精神的英国文学,看到了现代性在西方造成的各种混乱(如一战)和西方各国艰难的调适过程,看到了垄断资本与过度追求生产效率造成的经济“大萧条”,看到现代思想在中国造成的社会动荡,以及剧烈的社会变革给她的个人生活带来的生死考验(1927年南京事件)。她书写中国乡土

42) 刘禾,《语即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73-75。

的取向与向往现代性的鲁迅正好相反，中国乡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性转化的部分被当作反现代性的美德被赞扬，而这些在鲁迅看来往往是愚昧而顽劣的。

《大地》中王龙的思想惰性，抑或奴性成分远甚于阿Q。一个仅仅听说过革命却没见过真正革命的阿Q尚且能从自身的生存状态出发，主动寻求革命，而在大城市中被卷入革命潮流的王龙却从这股洪流中退出来，带着对革命的困惑和畏惧，以及从革命骚乱中戏剧性捞到的财富，回归乡土，重新过起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王龙的妻子阿兰在鲁迅看来则更是一个奴性的代表。她本来就是一个被卖掉的大地主家的粗使丫头，终身对丈夫、公公、儿子等一遭男性人等逆来顺受，只知道生育和劳作。《祝福》中的祥林嫂至少在死前的一天，拉住归乡的知识个体“我”，质疑传统文化中的“来世”问题，而阿兰死前的自我安慰只是生了三个儿子，而丈夫的小老婆却一个儿子也没有生出来。

中国乡土在赛珍珠的笔下被充分诗化和唯美化了。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信仰几乎达到宗教般虔诚，而读者似乎被告知，只要信仰坚定，目标明确（坚守土地，并获取更多土地），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一定可以获得理想中的田园生活。这在鲁迅看来必然只是一种女传教士的观点。当然，从赛珍珠这一方面来说，她的目标读者是“大萧条”语境下的美国人，回归土地是那些因失业而漂泊在都市街头的草根阶层的理想。

此外，赛珍珠在潜意识中受当时兴盛的文化人类学的影响，趋向于强调小型社区的文化自足性，这和她反现代性的思想倾向不谋而合。从她所书写的民国时期的中国乡土中，读者看不到政府对农村生活的干预，看不到蹂躏乡土的军阀，看不到西方传教士或现代工业品。人物的历史环境是暧昧的，似乎代表了亘古不变的自足的中国乡土，现代性对中国的入侵似乎只局限于小说中暗示的南方的大城市如南京、上海，一旦王龙的牛车离开城市，踏上归乡的路途，中国的世界就仍然恢复到几千年前的模样。

她的反现代性思想也表现在叙事方式上。与鲁迅乡土小说中安插归乡的现代性“游子”不同的是，她采用了人类学民族志似的“零度叙事”模式，白人作者彻底隐身，在中国乡村的环境中并没有读过洋学堂的知识分子，即便像王龙的大儿

子曾被送到南方进洋学堂这一事实，在叙事中也只作为一般事实一笔带过，从未影响叙事，也没有机会破坏乡土固有的文化传统。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中国农民奴性的微弱批判，或者是零批判，是让日益向左翼倾斜的鲁迅所无法接受的，由此他才向姚克表达自己对赛珍珠小说的否定性看法。

参考文献

一、西文文献

- Buck, Pearl S. "China the Eternal," *Living Age* (7 February, 1925): 325-326.
- _____. *The Good Earth*.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1.
- _____. *Mother*.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4.
- _____. "Book Review of *Living China*," *Asia*, 3 (1937)
- _____. *Dragon Seeds*.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42.
- _____. *My Several Worlds*.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54.
- Frye, Northrop. "Varieties of Literary Utopias," *Utopias and Utopian Thought*, ed. Frank E. Manue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6.
- Lye, Colleen. *America's Asia: Racial For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1893-1945*.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5.
- Ricoeur, Paul. *Du texte a l' action*. Paris: Seuil, 1986.
- Rosaldo, Renato.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1989.
- Snow, Edgar ed. *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7.
- Wallace, Henry. "Weekly Column," *Wallace Farmer*, 51 (Oct. 8, 1926): 1314.
- Wittfogel, Karl.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York: Vintage, 1981.

二、中文文献

FEI

费孝通, 《乡土中国》,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费孝通, 《费孝通自选集》,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

HU

胡风, 〈『大地』里的中国〉, 《赛珍珠评论集》, 郭英剑主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9。

LIANG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饮冰室合集·专集》, 上海: 中华书局, 1936。

LIU

刘禾(Lydia H. Liu), 《语即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 上海: 三联书店, 1999。

——,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 1900-1937)》(*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宋伟杰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8。

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上海: 三联书店, 1998。

LU

鲁迅, 〈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信〉, 《赛珍珠评论集》郭英剑主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9。

鲁迅, 〈1933年9月15日致增田涉信〉, 《赛珍珠评论集》郭英剑主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9。

鲁迅, 〈呐喊·自序〉, 《鲁迅全集·第一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鲁迅, 〈文化偏至论〉, 《鲁迅全集·第一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鲁迅, 〈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第四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鲁迅,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鲁迅全集·第六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鲁迅, 〈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鲁迅全集·第六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全集·第九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 QIAN
- 钱理群, 《与鲁迅相遇》,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 SHE
- 舍勒(Max Scheler), 〈道德建构中的怨恨〉(*Das Ressentiment im Aufbau der Moralen*), 罗梯伦译, 《舍勒选集》, 上海: 三联书店, 1999。
- SI
- 思慕, 〈猫头鹰的诅咒——斥赛珍珠的『北京来信』〉, 《世界文学》9(北京, 1960): 129-35。
- WANG
- 王瑶, 《鲁迅作品论集》,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WU
- 伍蠡甫, 〈评『福地』〉, 《赛珍珠评论集》, 郭英剑主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9。
- XU
- 徐育新, 〈赛珍珠——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 《文学评论》5(北京, 1960): 100-07。
- YANG
-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 YAO

姚锡佩, 〈从赛珍珠谈鲁迅说起——兼述赛珍珠其人其书〉, 《鲁迅研究月刊》6 (北京, 1990) : 39。

YE

叶公超, 〈反映中国农民生活的史诗——评赛珍珠的『大地』〉, 《赛珍珠评论集》, 郭英剑主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9) 6-9。

ZHAN

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Late Capitalism*), 陈清侨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ZHOU

周宁, 〈中国形象: 西方现代性的文化他者〉, 《粤海风》, 3(2003): 4。

ZHUANG

庄心在, 〈布克夫人及其作品〉, 《赛珍珠评论集》, 郭英剑主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9。

<Abstract>

Transnational Change of Rural Allegory:
Understanding Lu Xun's Remark of Pearl S. Buck's Writing of China

Zhu Hua

Lu Xun's casual remark of Pearl S. Buck in a 1933 letter shaped in a negative way the Mainland academic valuation of this 1938 Nobel Prize winner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Lu Xun's remark exist among scholars, which have always been colored by fluctuation of political sentiments instead of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present paper places Lu Xun's writings i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ax Scheler's "ressentiment" to explore his inner drive in emergent modernity in China. Fredric Jameson's concept of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s also applied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 Xun's writing and his nation-state identity crisis, which in turn reveals his didacticist critique of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Opposite to Lu Xun's effort, Pearl S. Buck follows the idyllic dimension to transcend alienation of modernity through her writing of rural China, which in the context of Great Depression was interpreted by the American readership as an allegory of hope. However, when Buck's rural China was translated back to China, the allegorical significance in America got lost among a society of disturbances. Therefore, to a leftwing writer like Lu Xun, Buck's idyllic rural China is but a missionary vision, conservative with imperial nostalgia.

Key Words : Lu Xun, Pearl S. Buck, Rural Fiction, National allegory, national character, ressentiment

투 고 일 : 2011. 1. 10. / 심 사 일 : 2011. 1. 20. ~ 2011. 2.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1. 2. 17.